

Book

反哺农业重在长效机制

——评《强农惠农——新阶段的中国农村综合改革》

◎党国英

多年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并出版了大量专题研究成果,这篇篇幅达50万字的《强农惠农——新阶段的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就是他们当下集中国农村研究之重要成果的最新力作,反映了他们的研究网络(团队)对农村问题综合性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全书由40余篇研究报告和论文组成,具体包括统筹城乡发展、乡村治理和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三个方面。几篇有分量的研究报告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骨干研究人员在历时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的,书中还收录了几篇国外学者介绍国外农村公共服务工作的经验、讨论中国农村政策调整问题的论文。

要说,这本论文集的一大亮点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先生的文章。段应碧先生认为,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农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农村发展还面临严峻挑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多年来欠账很多,是我国粮食产量不稳、农民增收不快的重要原因。另外,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得比过去更加严峻。在传统上我们认为有比较优势的农业生产领域,相应的产品出口增长并不快,而那些我们总以为缺乏比较优势的方面,相应的产品进口增长大大超出了预计。连续三年,我国出现了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这在历史上是头一遭。国内农业生产形势也面临一些新的复杂情况:农业小规模经营不利于农业竞争力的提高;农民高度兼业化不利于农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大量农村轻壮劳



《强农·惠农》——新阶段的中国农村综合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

动力转移到城市,农业主要依靠老年人和妇女经营,不利于农业吸收新的科学技术。对于这些新问题,段应碧先生主张尽快加强三方面课题的研究:一是怎样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二是现阶段小规模农业如何转变为现代农业;三是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也可以说,《强农惠农——新阶段的中国农村综合改革》这本论文集正是对段应碧先生所提问题的一个回应。书中汇集的研究报告和论文从不同方面探索了这些基本问题的具体方面。

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骨干研究人员撰写的几篇专题调研报告带给人们诸多思考。2007年,由中改院副院长迟福林先生组织课题组赴江苏、浙江、四川和湖南等省调查,就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状况做深入的案例研究,同时,他们还在全国范围做了农户问卷调查。这些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对于我们了



解目前我国农村实际状况和农民的心理状况大有益处,对于政府有关部门调整政策更有参考价值。

例如,调查发现,大约46%的农民担心国家的“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会发生变化,还有约7%的农民对这项政策是否会改变无法判断。这个数据说明,目前国家的农村土地政策目标与它的实际作用很不一致。土地政策的设计是要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意识,以便耕地保护和利用在我国十分稀缺的耕地资源,但农民实际感受到的土地财产权并没有政策所期待的程度。显而易见,调整土地政策已是十分必要。

与偏重理论和历史探讨不同,多年来,中改院对中国改革研究始终注重通过第一线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改良的建议。本书所提“以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推进新阶段的农村综合改革”十二条改革建议,正反映了这个显著特点。这些建议可以概括为四个基本方面。

第一,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新阶段农村综合改革的根本目标。这个建议在当前很有现实意义。近几年,国家把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作为农村综合改革的根本目标,而中改院课题组则认为,农村综合改革局限于这三个目标是不够的,进一步改革应该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整个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建设以及自上而下涉农机构的统筹安排。我以为,这个改革建议的确是切中时弊。

第二,以统筹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我完全赞成中改院课题组的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总结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一切成就应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贡献;一切问题则应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程度的不足。判定一个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的标志,当然主要是看其要素流动的市场化程度,若按这个标准,我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基于这样

的认识,中改院课题组提出了详尽的推进我国农村要素流动市场化的若干具体设想。

第三,把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作为新阶段农村综合改革的根本目标。中改院课题组为此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调整建议。我注意到,有的建议已经得到高层的注意,一些酝酿中的改革方案事实上已经采纳了他们的方案。比如,他们建议在国务院成立地方事务部,以便更合理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加强国家对农业大省和其他落后地区的经济支持。这个建议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是有道理的。

第四,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着力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这一条做好了,众多复杂关系的理顺也就顺理成章了。中改院课题组基于对现状的切实了解而提出的多种设想颇中肯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著译者言

市场规则和体系可以有多种形式

——关于《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高伟

曾任教于剑桥大学,现为赫特福德大学的研究教授的杰弗里·M·霍奇逊,对中国普通读者来说似乎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对于经济学读者而言,这个名字却如雷贯耳。霍奇逊是世界演化经济学会会长,《制度经济学》杂志主编,不仅是演化经济学的卓越代表,而且引领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作为《社会理论视阈中的经济学》系列出版物,《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是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最新力作。全书将哲理、历史视阈与经济学严密推理融为一体,在一连串妙语警句中讨论一般理论与历史特性问题,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学,并展望新世纪的经济学发展趋势。因为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纲领,本书不仅是卓越的经济思想史著作,而且是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之作。霍奇逊在全面回顾了整个经济学思想史的时候,尖锐地指出了各个时期经济学代表人物思想在科学性上与缺陷所在,其演化观点贯彻始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建社会科学的研究任务,而且在他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下一步制度研究的初步框架。

霍奇逊在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一般化的理论方法是重要的,但是其价值有限。这些一般性方法必须使用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保持敏感的分析方法加以补充。参照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思想可以探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众多的市场制度和许多可行的制度结构,市场自身包括规则体系,而且这些规则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采用功能性的市场制度并不意味着规则和制度的作用减少了。相反,这只是由另外一套制度和规则取代了原有的制度和规则。他认为“自由市场”的支持者经常忽略这个问题,并且低估了培育正常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花费的时间。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可行的、适当的制度可以由孤立的“自由”个体的交互作用而自行出现。在最低限度上,也需要有相互结合的制度,这些制度可以协助建立契约和产权制度。当市场经济的运行违背了公众利益,大多数发达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 (英)杰弗里·M·霍奇逊 著 高伟 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的市场经济中都存在抑制这种市场发展的规则,而且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都存在有效的制度以较少腐败和诈骗行为。我相信,中国的读者会发现,这些观点对于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制度快速转型时期的中国是极为中肯的、有益的。

说起来,本书也是霍奇逊早年作品如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翻译出版)的一个继续,其后续作品还可以进一步研读《制度经济学的演化——代理、结构和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达尔文主义》(Routledge, 2004)以及《达尔文和马克思影响下的经济学——关于制度和演化主题的经济学论文集》(Edward Elgar, 2006)等。

说到经济学界对本书的评价,我在此举出两位代表人物。英国艾克斯特大学的约翰·马洛尼说“霍奇逊教授阐明了一些自从马克思之后就很少存在的研究方式:可以超越纯粹的经济学的历史经济学。”美国马克特大学的约翰·戴维斯认为:“杰弗里·霍奇逊凭借《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一书向着弥补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鸿沟迈进了一大步。这个鸿沟是指:如何解释经济生活的具体的、历史特定的问题。许多学者已经批评了—般理论构建的缺陷,他们渴望一个更具历史特性的经济学。霍奇逊提供了自己的思维周全的方案——明智地借助演化理论和复杂性理论中的普遍性概念。霍奇逊将自己的框架建立在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的审慎考虑之上,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这对于将经济学塑造成真正的社会科学来说是重要的。”

国家大战略中的珠三角

◎吴中校

改革开放30年,“珠三角”从小概念(广东省内珠三角东西两岸九个地市)发展成为大珠三角(再加上港澳),乃至近年来的泛珠三角(即9+2省区合作)的概念,这是经济发展推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势所趋。进入21世纪以来,珠三角加快内部整合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也不断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发展与环保如何平衡?产业结构如何升级?外来工待遇为什么难以提升?究竟是广州、深圳还是香港来主导珠三角?等等。加上长三角整合之势所形成的对比,珠三角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越来越多人关注。3年前,一篇《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在网上广为流传,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些问题。现在,肖南方先生推出了《珠三角大悬念》,从点到面系统地探讨珠三角未来的发展趋势,书中列出的几个大悬念自然是最吸引人们注意力的。

首先是,作为中国三大引擎的珠三角何时也能有一个“新特区”(综合改革试验区)深圳最早向国务院申请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批复,深圳“特区”如今又“特”在哪里?目前我国的新特区分别是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以及重庆和成都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去年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在向人大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落实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推进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经济特区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显然,把深圳作为综合改革试点,中央不但有此打算,而且已经提上日程。但是让人困惑的是,深圳至今仍未跨出这最后一道“槛”。

事实上,深圳早已在着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改革创新综合试点等。2005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视察深圳时说得非常明确:“经济特区本来就具有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和使命,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国家改革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言外之意,作为特区,深圳在改革创新的空间上其实应该比综合改革试验区更有条件,也应更有作为。此后深圳在新特区的申请上也就顺天时而动,而不那么迫切了。因为大家终于发现,深圳虽然没

有获得名义上的“新特区”名号,但是中央原则上已经通过,按照这个方向做就行了。

深港创新圈方案首先由深圳提出,由于这个方案可以弥补香港科技产业的不足,而在近两年得到香港的积极回应。不过,香港自然不满足于这样的创新合作,他们有更大的谋划,那就是“港深大都会”方案,深港创新圈的发挥空间因此受到很大限制,不过可以认为是深港合作的一个大环节。但无论是哪一个方案,中央都没有明确表态。

第二个大的悬念是泛珠三角合作为什么没有得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支持?或许泛珠三角概念与中国长久形成的区域发展理念不尽吻合,比如江西这个传统上属于华东经济圈的省份,在泛珠三角就显得很尴尬,尽管珠江水系的涵盖了一小部分江西省。另外,因为资源的考虑把云南、四川拉进来也是值得讨论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以广东为主导的方案中,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不清晰,至少是没有体现出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虑及此,第三大悬念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不但泛珠三角没有列入中央级规划,就连广东省也没有单独提出。“与之相对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已被作为中央级的两大区域规划试点率先启动”,广东有学者为此而担忧。尽管国家发改委在回应这个问题时说,珠三角之所以未被单独提出,是因为该地区问题可以在省内解决,无须提至国家层面。但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不说泛珠三角合作,珠三角内部合作涉及港澳,必须有中央层面的协调。因此,中大的缘由广东省长黄华华对媒体说得清清楚楚,至于国家未将“泛珠”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功能区,国家有国家的考虑,广东不会因为纳进就发展,不纳进就不发展。他说,“9+2”是自愿的合作,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广东将一如既往地推进“泛珠”合作。

“十一五”规划对广东及珠三角的交待模糊,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巨大悬念,但也给珠三角更大的想象空间——珠三角区域发展战略需要从一个中国社会发展转型、并作为世界大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提出,而现在的区域合作



《珠三角大悬念》肖南方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方案都不足以支持这样的宏伟构想,因此,对于这些局部性方案中原则上认可,在现有条件下可以逐步实施,但是都不可能归于系统的全国性战略方案之下的。

如前所述,珠三角全局性战略应是基于中国社会急遽转型、世界性大国的背景提出,应该基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世界级国际都会这个条件提出,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还应有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多重意义和作用。因此,全局性战略不是没有,而是要等待提出的时机,尤其是香港社会的心态和政治氛围。

香港回归以来,与内地的整合颇多曲折。关于深港大都会的提议,二十多年前深圳和香港都有人提出,但是那时香港一直抱着“大香港主义”心态,和者寥寥。而现在香港政府曾推行深港融合的十大建议,则让香港急于与内地整合的心态一览无遗。港人心态的转变,其背后也是经济的动力,一方面中国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币加速升值,已经隐隐然可以看到一个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大国正在崛起,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飞速发展和上海潜藏的实力让香港备感压力——香港弹丸之地,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不进则退,今日不努力,岂能有明天?

目前香港对与内地整合的积极心态与热情,为下一步珠三角大战略的提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珠三角的诸多悬念,都为珠三角预留了充分的发展空间,潜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新书过眼

《海星模式》



(美) 奥瑞·布莱福曼 罗德·贝克特朗 著 李江波 译 中信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这本极富想象力的作品认为,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的组织模式就像蜘蛛,而现在正在改变着企业和世界面貌的却是海星型的组织模式,它强调在适当环境下的分权,倡导公平的接近机会、丰富的网络关系,这种模式为我们理解自我组织系统的模式和潜能提供了一个强力透镜。如果砍掉一只蜘蛛的脑袋,毫无疑问它会死亡;但是砍掉海星的一条腿,它却还会长出一条新腿,就连那砍掉的腿也会长成一个全新的海星!正是海星模式促成了维基百科、craigslist 和 Skype 的成功,使互联网成了孕育无限组织的温床。从 IBM 到 Google,再到美国政府,这些地位稳固、已经步入正轨的大公司和政府机构,都在学习掌握如何利用海星型组织原则。或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组织可能一部分是海星,一部分是蜘蛛。但从发展方向看,海星越来越代表未来。

《公司》

——对利润与权利的病态追求



(加) 乔尔·巴肯 著 朱近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股份公司今天已经统治了我们的生活。它们决定我们吃什么,看什么,穿什么,在哪工作,做什么,简直无处可逃。但在乔尔·巴肯看来,股份公司是吞噬文明的恶魔,贪婪、剥削成性、不可遏止。它具有人的权利却没有人的道德感:一档电视节目吹捧通用制造的卡车在二战期间支持盟军修路架桥的贡赋,但是它却没有提及,这个公司同样也为敌军制造战车;而IBM为纳粹工作的动机,“跟纳粹主义毫无关系……它只与利润有关。”……我们都是潜在受害者,因此必须弄清股份公司是如何使其危害变得无法控制的。巴肯为写作本书进行了范围广泛的采访,如美国辉瑞制药CEO汉克·麦金内尔、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洪特、著名批评家乔姆斯基等,从多个视角考察了股份公司作为一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并提出了改善目前现状的可行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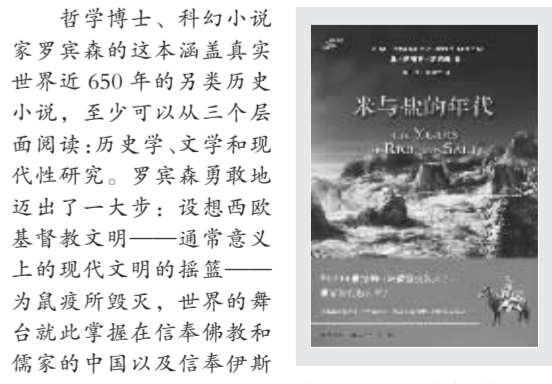
《美国银行》



(美) 莫里亚·约翰斯顿 著 曾伏娥、刘颖斐 译 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这是一部出自一个播音员、记者之手的美国银行发展史的企业传记。从吉安尼家族时代美国银行奇异的创建期开始,到鲁道夫·彼得森时代美国银行的繁荣期,再到萨姆·阿马科斯特时代的技术革新以及银行治疗师,以一个个人心坎的情节讲述了美国银行近百年的风雨历程,突出了美国银行成长期的锐意进取和创新以及为摆脱成熟期的钝与麻木而推行的变革努力,在成功复兴和崛起过程中的制度沿革,向世人展示了一幅美国银行发展的全图。作者本是新闻从业者,又长期为《纽约时报》、《国家地理》及《名利场》等报刊撰稿,很会琢磨读者心理,把一个原本沉重的题材写得跌宕起伏,致力于让读者在了解美国银行沿革历史的同时,更记住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他们的野心、决断力、勇气与信心。

《米与盐的年代》



金·斯坦利·罗宾森 著 李玉良、刘建立 译 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哲学博士、科幻小说家罗宾森的这本涵盖真实世界近650年的另类历史小说,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阅读:历史学、文学和现代性研究。罗宾森勇敢地迈出的一大步:设想西欧基督教文明——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文明的摇篮——为鼠疫所毁灭,世界的舞台就此掌握在信奉佛教和儒家的中国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手中,人类文明于是和欧洲、基督教宣告脱离关系,由此构造了一部以东方为中心的世界近代史。小说让秉承着相同精神的人物们(他使用了非常巧妙的手法象征化了传承),从宗教和日常经验中提炼出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方法论,从而把文明引导上现代性的道路。不过,虽然罗宾森力图讲述离开了基督教的人类文明,然而日常的经验和思维的定势让他在某些地方无法避免地陷入了相同的泥沼。